

一本翻譯的《中國通史》  
——兼論歷史教學與史學本義  
台北：稻鄉出版社，1990

莫以明

這本中國通史譯自昭和52（1977）年日本講談社出版的《新書東洋史》中《中國之歷史》前四冊，分別是：

（一）伊藤道治著《中國社會之成立》，自古代文明之誕生至西漢滅亡。

（二）谷川道雄著《世界帝國之形成》，自後漢以迄隋唐。

（三）竺沙雅章著《征服王朝的時代》，敘述唐末五代以及遼、宋、金、元的歷史。

（四）岩見宏與谷口規矩雄合著《傳統中國之完成》，檢視鴉片戰爭之前的明、清史相。

去年台北稻鄉出版社將此四冊譯成中文，合為一冊，名為《中國通史》，希望能作為大學院校學生修習必修科目「中國通史」的教科書（見出版說明）。

中國通史之所以成為大學必修課程，實與民國六十一年時，中華民國政府退出聯合國，中共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客觀環境相關。為了宣揚民族文化，加強反共教育，教育部擬訂了「民族精神教育方案六項原則」。此即：復興中華文化，加強民族意識，發揚固有道德，恢復民族固有智能，確定「主義、領袖、國家、責

任、榮譽」五項信念，明恥教學加強仇匪教育。其落實配合措施之一，即是將中國通史、中國現代史與國父思想並列為大學院校共同必修科。於是大學中國通史教學就被動員為民族精神教育之一環。

如果說，中國通史課程制定之初乃是以加強民族精神教育為其主要教學目標，那麼翻譯日人著作並擬用為「教科書」，是否適宜呢？尤其是當我們的社會口口聲聲指責專家學者、大眾傳播媒體受到外來文化侵略污染，不能從中國人的觀點說明問題、討論問題之際，這本「教科書」該如何看待，的確值得我們深思。

從社會理論上來說，個人必須經由不斷地學習，也就是所謂社會化的過程，才能適應其所屬的社會，從而成為其中克盡職責的一份子。「教育」正是一種制度化的社會化過程。而歷史教育所要加強的民族精神，所要培養的愛國情操，不就是希望透過分享共有文化遺產，加強學生認同社會群體的一體感，並從而接受國家組織的正當性？可是，我們的學生與教師似乎並不認同此一教學目標，許多學生甚至因此將歷史課程視同政治思想課程，加以排斥。結果，不但民族精神無從發揚，就連歷史教學都受到厭棄。

學生不喜歡通史課，原因當然很多，不能只歸咎於教學目標出了問題。可是，無可否認這的確是關鍵性的理由之一。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我們的民族精神教育長久以來早已淪為陳腔濫調的口號與教條，令人厭煩；同時其中更包含了太多的誇大不實與歪曲遮掩，教人不敢輕信。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這其中還隱藏著一種對歷史學本質的誤解。那就是承繼科學史學中客觀的歷史認識論，將歷史看作是已經過去的一些確定事件。換句話說，許

多人仍然相信：可以有一套超乎一切團體、黨派或特定立場，全面又客觀的歷史敘述。「歷史」既然只是一套已然定型的知識或資料，學習歷史，也就是將人名、地名、年代、故事以及一套理念背誦記憶起來。這樣的認知，配合上現行聯考制度「標準」答案的訓練，一般人自然要懷疑：在國中、高中各背過三年歷史後，再背一遍中國歷史的意義何在？

事實上，經過二十世紀對各種知識性質的檢討與反省，歷史知識早已不再是單純因為記憶而留存下來的「過去」；所有的「歷史」過程及其意義，也就是所有的歷史知識，都只是「人」觀察、選擇、描述與記錄的結果，而所有的人又都無可避免地有其私見與立場的限制。因此，歷史知識其實是在求知者主觀求知欲望驅動下，對既存歷史材料所作的選擇、解釋與說明，是一種不斷隨著社會結構、價值意識變動，重整往事，以期說明現狀的知識活動。所以歷史知識當然不能在記憶與背誦中學習；相反地，學習者應該經由「瞭解」，就不同立場的歷史解釋作討論、分析、反省，在提昇個人思辨能力的同時，也去理解別人的價值立場，從而擴充自己的觀點，養成開闊的胸襟。易言之，歷史教育的真正意義及價值所在，應在於經由上述歷史知識的隨時調節性，培養學習者個人自主的理性認知能力；並且透過提出批評且接受批評的討論過程，體認社會團體的複雜性，進而尋求個人與團體之間的整合關係，建立個人對社會團體的認同感與參與感（也就是所謂的民族情感與愛國情操）。一個完整的社會化過程，原應兼及文化傳播與個人人格發展兩方面。真正的歷史教育也是如此。

這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承認：在歷史教育的過程中，學習者乃是經由往復的分析、討論與反省，來認知被給予的歷史知識，

以及自身的侷限與偏執；再從較寬廣的觀點出發，相應於社會變遷，重新掌握並賦予文化遺產現實的意義。那麼，我們不僅不用擔心，學生會因為接觸到「異端邪說」而迷失；相反地，我們更應該儘量提供不同角度，不同立場的歷史著作，刺激學生從不同的史事陳述或解釋中，瞭解別人的觀點，也反省自己的立場。事實上，也唯有在這樣的教育下，我們的社會才能真正理性且自主地發展出自己的觀點，不致於在一貫被灌輸的習慣下，同樣被外來文化灌輸了。不過，在提供「材料」之時，當如何有效引導學生理解敘述者的立場觀點，以進行思考分析，自是另一個不容忽視的課題。

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向來很複雜。近代以前，日本在中國文化深切影響下努力形成自己的文化。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將此喻為：一個兒童在長者指導下漸次成長的過程。明治維新後，日本傾心於西歐文明，積極地想要脫亞入歐。他們輕視近代中國的衰弱無能，卻又無法漠視古代中國的光輝燦爛。何況為了建立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也必須先了解中國才能征服並統治中國。這種研究態度雖不可謂正確，我們卻也不能不承認，數十年累積下來，在某些方面確有所成。二次大戰的挫敗，使日本人原有的天皇制帝國主義的國家民族觀甚至世界觀都有了重大改變。這種自我認識及世界觀的改變，自然影響到他們對本身舊文化遺產和世界諸文明的評價與理解。而且隨著歷史學及其相關學科研究方法、角度、重點的轉換，日本人的中國史研究也有了新的面目。不過，本文既無意也無能力對日本之中國史研究情況作全面性的介紹。下面僅就新譯的這本《中國通史》所呈現的部分問題，稍作討論。

正如前面所說，這本《中國通史》係譯自講談社《新書東洋

史》的前四冊。日本學術界所謂的東洋史，一度幾乎指的就是中國史，如今則已將範圍擴大為不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史。這套東洋史總共有十一冊，除前四冊外，另外的七冊分別是：（五）《走向人民中國之路》，（六）《印度的歷史》，（七）《東南亞史》，（八）《中亞的歷史》，（九）《西亞的歷史》，（十）《朝鮮史》，（十一）《解放的世紀》。也就是說，稻鄉雖將其中有關中國歷史的四冊，合併為一本中國通史，但基本上，它原是被安排為亞洲整體歷史的一部分。

將中國史納入世界史，及把東亞史或亞洲史視為一整體來研究，一直是日本中國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不過，在早朝，這種將中國及其周邊視為一個「世界」來檢討，卻又借用西洋史時代區分方法來替中國史分期的研究取向，也反映了近代日本思想、學術中亞細亞主義與西洋中心觀混淆並存的奇特現象。日本學者對此當然早有所悟，也不斷地在研究方法與對象上作調整。事實上，日本人所要擺脫的，除了西洋中心觀外，還有所謂的中國中心觀。這套《新書東洋史》試圖彙集亞洲各地區的歷史發展過程，正是為了要無所偏頗地將亞洲世界呈現出來。而在處理中國的歷史發展時，不斷強調中國與周邊地域的相互交涉，也是基於同樣的理由。這雖然是源自一種研究外國史的心情與立場，但對於長久以來，一直把目光焦點放在中國域內（其實「中國」的範域就頗難界定），而且被王朝史套牢的我們，的確頗有借鏡之處。

以第二部分《世界帝國之形成》的處理來說，作者谷川道雄秉承了他一貫重視理論架構的態度，將後漢至隋唐的中國歷史放在整個東亞史中來觀照，強調周邊各種族與所謂漢族的互動關係——秦漢帝國之所以亡，隋唐帝國之所以興，皆以周邊各種族的

勃興為契機。於是中國第二次統一帝國的成立過程，與周邊世界第一次統一國家的成立過程，便恰是同時發生又互相影響的歷史。在統一過程中，谷川將歷史發展放在兩條主線上來處理：一是漢帝國政權所立基的血緣主義鄉里社會，因私權化而崩解，再藉著貴族個人人格重組共同體的經過；一是漢人在藉武力征服周邊各民族形成多種族世界帝國後，因漢族本位而引發的另一血緣問題——胡漢衝突——的消弭經過。

值得注意的是谷川觀察切入的角度及其敘述的脈絡。正如谷川所言：在以往的書籍中，常把五胡十六國的歷史，以「五胡亂華」之類的字眼來說明，但這會給人一種印象，好像外族把中國社會蹂躪得毫無秩序。谷川問道：難道外族統治華北時，果真看不出任何秩序嗎？於是谷川就把自己的焦點放在漢世界帝國解體後所產生的社會秩序，以及此種秩序如何凝聚成為國家體制的問題上。這當然是承自其《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一書的體系架構，要為隋唐帝國的成型及特質尋求歷史解釋。而華北地區政治社會的起伏轉折也就在谷川筆下，成為此一時期歷史的主流。這樣的敘史當然不是全無問題，但確實跳出了舊有的治亂觀念，從不同角度，落實地重新把握歷史。

尋找新的角度檢視歷史，其實是二十世紀歷史學者共同的努力的方向，不論是想擺脫帝王將相政治史的新史學，還是社會主義歷史學所強調的社會經濟史觀，乃至跳脫國家、民族界限，從人類普遍立場關心個人市民自由、社會公正的社會史研究，都在盡力追隨現代社會的脈動，重新詮釋歷史。雖然不少新的角度、立場乃至價值觀，仍有仁智之爭，但其中儘有可以攻錯之處。在本書中，除了谷川對五胡亂華的重新認識，其他作者也有值得一

提者。

如第一部分《中國社會之成立》的作者伊藤道治，就是從農民與國家的關係著眼，來理解中國如何由殷周之封建，歷經春秋戰國之變局，而建立秦漢帝國。伊藤認為：中國古代都市國家與領土國家之不同，並不在領域的有無，而是在國家如何支配領域內的農民。殷周時期的國家完全依貴族層所居住的都市之意向運營，農村只是收奪的對象，所以是都市國家。春秋戰國以下的領土國家，則將農民編入國家的兵制之中，國家以個別農民為統治對象，不再僅由都市決定其行動。藉著法治主義完成統一的領土國家，至漢武帝時又轉向禮教主義，藉鄉黨意識整編地方農民，其根本則是以皇帝為父的儒家政治意識。

比較上，第三部分《征服王朝的時代》與第四部分《傳統中國之完成》都沒有像前兩部分那樣體系整然，而是採取綜合性的歷史事實陳述，展現該一時代的歷史風貌，然其對於社會經濟文化面的強調與處理角度，仍有可觀。

撰寫第三部分《征服王朝的時代》的竺沙雅章就特別強調安史亂後，河北三鎮武人文化的歷史作用，指出河北盛產絹、鹽，有其財政基礎，除了為唐防範外族的入侵，也將中國文化傳給東北的新興民族，對後來興起的征服王朝提供了養分；同時在唐全面廢佛之際，保存了大量的佛教文化。竺沙承認河北武人文化粗野低俗，質素較貴族文化低落，但是它對後世文化確有貢獻，所以「我們不應為中央知識人的評價所惑」。這樣的陳述，的確值得常為狹隘民族主義、士大夫優越感所侷限的我們深思。同時也就無怪乎竺沙會將馮道的歷史角色定位為：在異民族統治所能容忍的狀況下，努力安定民生，拯救民衆於苦境的無國籍人物，並

將三百年後的耶律楚材稱爲是馮道式的政治家。或許有人會說：日本學者肯定馮道式的人物，是想替與侵華日軍合作的漢奸辯解。不過，從日本戰後史學發展來看，竺沙的出發點，或許更與反戰思想有關。

對於這個時代的異民族王朝，竺沙基本上肯定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所建立的民族國家及征服王朝應有其維護民族傳統的立場。相應於此，第四部分的兩位作者谷口規矩雄（第一、二、三章）與岩見宏（序章、第四、五章），對於曾被譽爲中國盛世的永樂時代大遠征事業，以及擴大清朝版圖的乾隆征伐行動，皆未給予正面的評價。谷口雖也承認：自十世紀以來，一直見迫於北方民族，維持屈辱和平的漢民族，由於永樂的遠征，得以將北方民族重新納入朝貢體系，但是他更強調戰爭對人民所造成的痛苦與負擔。比起政治軍事上的擴張，這兩位作者似乎更願意談些社會經濟面的變化，與人民來往交流的實態。諸如因工商業發達而帶動的種種社會新面貌與新問題，自明末開始與歐洲所作的接觸與所造成的影響，還有漢民族開拓邊疆、對外移民等等。

當然，上述的處理方式也不是沒有問題存在。以第一、二部分而言，伊藤、谷川都先設定了主要問題，再環繞此一主題進行討論；也就是從社會結構的組成方式上，探討該時代的特殊相，並爲其時的國家組織重新定位。這樣做的好處是焦點明確，脈絡分明，並予人完整的時代感。但是無可否認地，這樣也會犧牲掉與主題不明確相關的所謂枝節問題。例如在看完第一部分第五章〈劇變的社會與思想〉後，一般讀者或許就會問：怎麼儒家不見了？事實上，作者並未忽略儒家的重要性，並在頁118（禮、法關係）、134（焚書）、156（武帝尊儒）三處論及。問題之產生，或許只是

因為在原來應有的地方未能稍作交代。至於理論架構最明顯的第二部分，谷川既以華北政治社會變遷作討論主線，則對於江南人格主義貴族如何轉換為強調血緣氏姓的門閥，又如何建立其經濟基礎的莊園等問題，也就無暇顧及了。

其實，這也牽涉到一本書該如何寫法的問題。日本出版界之「新書」原是專家以通俗形式披露其學術研究所得的一種嘗試，藉以為一般人提供新知。《新書東洋史》原非面面俱到的教科書，作此要求或許過苛。而類此不夠周延的問題，除了與作者自身著眼點有關外，有時也受限於研究成果之不足。竺沙就明白表示：宋元時代有待今後研究的部分甚多，金元治下的社會情況也尚未解明，因此當時劃分為兩大潮流的歷史實相（北宋——金——元，北宋——南宋——元），究竟有何差異，又如何受王朝交替影響而變化，仍無法作通貫性的整理。

不過，我們也不能不承認，缺乏理念體系導引的歷史敘述，即使能面面俱到，也很容易成為一些現象的描述與事件的堆積。第三部分與第四部分的處理形式，最類似教科書，卻多少都有這方面的問題。竺沙原想就八世紀到十四世紀中葉的兩大對立面，也就是中國本身南與北，以及中華民族與北方民族的抗爭為軸心，加以考察。他也提供了豐富的資料與社會面相，讓讀者知道許多相關的歷史現象。可是一旦將這些全部彙總起來，卻又似乎仍只是一幅模糊，尚待「連連看」的虛點圖像。我們只是更清楚地知道：當時的歷史確實是在兩大潮流的傾軋抗爭中前進。但究竟有何改變？對後代有何影響？連竺沙自己都很遺憾地表示：目前還不能說是很清楚。這是否也是源於研究成果不足，致令作者徒有巧婦無米之歎呢？

就全書比較來看，第四部分的體系性最弱，幾乎可以說是沒有什麼理念架構，只是作者根據時代先後，將發生過的重要事件羅列出來的編年史。就以第二章有關陽明學的介紹來說，谷口先用萬里長城的修築說明這個時期的北邊已趨平靖，但是明帝國內部仍有農民變亂相繼發生，接著提到由於明武宗寵任宦官，致使情況更爲惡化，終有寧王宸濠起兵造反，幸賴王守仁智勇雙全，只花了四十多天就平定了亂事，然後簡單介紹王守仁的出身、學說要點和傳承，即告結束。從表面上看，讀者對這一時期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已略有所知，但是陽明學與此一時代之真正關聯何在？究竟如何引發？又造成什麼影響？卻仍是疑團滿腹。讀者既不明白這個時代在根底裡出了什麼問題，也就難以了解於此出現的陽明學究竟有何意義。

經常參考中外新研究成果的教師與學者，或許不覺得這本原出版於1977年的「新書」有什麼新鮮處。不過書中每一部分皆以序章提出問題點貫通整個時代的寫作方式，及其敘史的角度，對學生來說，應該還是相當新鮮吧！

中國通史成爲共同必修科將近二十年，市面上流通的與圖書館中典藏的通史教科書也不下三、四十種，但是要找出大家公認適宜的，卻不容易。比較起來，最受推崇的竟仍是錢穆先生在民國二十八年所寫的《國史大綱》。這部書洋溢著濃烈的民族情感與愛國情操，充滿了對中國歷史的溫情與敬意，就加強民族精神教育的教學目標而言，確乎無人能出其右；其中部分論斷之精闢，即使在五十年後的今天，仍值得稱道，但其中某些內容之陳舊落伍亦是實情。因此，目前不少大專授課教師採用單篇論文爲教材，甚或編成論文集。這樣做雖然比較能跟上時代，但也不是沒

有問題。現在學術界的風尚是以發表的著作、論文爲其學術地位的判準。而所謂的著作、論文又以專題研究爲尚，因此研究取向越趨專精，少有大範圍、通論性的論文可用。況且擔任是項課程的，多是初出校門的年輕教師，能否透過單篇論文提供學生完整而又通貫的歷史概念，多少有些問題。畢竟斷代史或諸多單篇論文的聯合，並不就等於通史。

討論至此，問題似乎又回到了原點，如果我們承認歷史知識的本質具強烈的變動性，似乎便不必期待有一本適合所有人，又能照顧全局的教科書出現，我們只期望：能夠不斷有人重整研究成果，爲我們的學生寫新的教科書。只是，爲什麼眼前的這本新教科書是由翻譯而來的呢？這又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了。

最後是有關翻譯與編輯上的問題。翻譯的最高目標是信、達、雅，但是不同的語言習慣，實源於思考方式的差異。日本人喜用雙重否定以表示肯定，又慣以「可能」、「應該」、「難道不是」加上不確定的疑問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意見。如果原樣照譯，的確不合中文表達方式；換成中文語法，又難以表現日本人不願斷然表示意見的思考方式與價值立場。實在是兩難。不過，引文的處理或可稍作商榷。譯者翻檢史料將引文復原，固然是認真負責的表現；可是，如何對原文作解讀，有時正是研究重點所在。或許一個較好的辦法是：將作者對該段文字的理解忠實譯出，再附上原文吧！

原書中有不少幫助讀者了解歷史實況的地圖與圖片，譯本只採用了極少的一部分，原書末所附的中國、世界、日本大事對照年表，譯本也未收錄，實在很可惜。另外，譯本錯字頗多，想必是編輯作業的疏忽，希望再版時能予訂正。